

◀ (上接 13 版)

这个修正案引发的舆论战和情绪对立很快带来外交关系的重要后果。包括以色列驻波大使在内的以色列官方抨击反犹主义在波兰抬头。以色列还拒绝了波兰企业对以色列证券交易所的入股。而波兰则有执政党议员呼吁驱逐以色列驻波大使。美国国务院则就修正案发表声明,称该修正案有损“自由言论和学术讨论”,并将影响波兰的战略利益及其与美以的关系。美国驻波大使馆威胁暂停美对双边军事合作项目的拨款。美国还对波兰政府实施外交制裁,包括白宫在内的美国政府将不会接待波兰总统或总理来访。3月26日,59名美国联邦参议员还联合致信波兰总理,就去年10月波兰议会通过的一项不利于在美德屠杀幸存者的资产追偿法案进行抗议。该法案规定,只有居住在波兰的直系亲属才能获得祖辈在波兰的遗留资产。

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波兰政府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缓和与犹太人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如通过驻以大使并派遣特别外交代表团加强对以沟通,波兰总统为1968年波兰反犹、排犹致歉等等。

施害者? 受害者? 拯救者? 波兰在大屠杀中的角色纷争

波犹(以)之间围绕纳粹大屠杀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论争由来已久,新世纪以来则日益被双方视为体现集体身份认同的本质性因素,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在2017年12月就职典礼演说中,新任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称非犹太裔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拯救了犹太兄弟,这显示了“何为波兰人本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德波斯基(Slawomir Debski)则如此回答“何为波兰人?”的问题:“我们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国家,是两种极权主义体系的受害者”。而以色列外交部秘书长在会见专程为新修正案赴以沟通的波兰外交代表团时“开宗明义”:维护大屠杀记忆是个高于波以双边关系的问题,它是“深入犹太民族本质的中心议题”。

对犹太人在纳粹“暗黑王国”中受难报以同情和愧疚,这种集体心理在战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广泛存在,在波兰人中也不例外。小说《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 作者为基督徒)描述了波兰女子苏菲(天主

教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经历:为了让儿子存活,把女儿推向焚尸炉;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工作;忍受纳粹的调戏、强暴、变态的凌辱;违心地以色相勾引纳粹司令官;恐怖、耻辱、罪恶和绝望笼罩着破碎的心灵。但即使这样一个受害者,也对命运比波兰人更加悲惨的犹太人充满了负罪感,而宁愿在移民美国后忍受犹太情人的暴虐。这部畅销小说(以及根据其改编的电影)以一种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一个纳粹主义的受难群体(基督徒/波兰人),在面对另一个受难更严重群体(犹太人)时的沉重精神负担和赎罪意愿。

但如何定义波兰在纳粹大屠杀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 受害者? 拯救者? 还是施害者? 这在波犹之间带来经久不息的论争。

在波兰长期以来塑造的集体记忆中,波兰人倾向于接受自身受难者、抵抗者和救助者的角色和身份。波兰在历史上一再遭受德、俄等周边强国的瓜分;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直接占领;除300万波兰犹太人,还有近3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在二战期间遇害;波兰流亡政府一直在参与抵抗德国纳粹,并努力向世界提供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情报;还有6700多名波兰人因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救助犹太人而被“亚德·瓦谢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多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流亡政府在内的波兰政治组织也没有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纳粹领导的种族灭绝。这些历史事实,似乎可以印证波兰人集体记忆中关于其在大屠杀历史的正面身份体认,支持其民族自豪感和受害者悲情。这种倾向主导着波兰的相关历史研究、教育机制,有时还体现为外交诉求。

波兰准官方机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主要使命就是维护波兰民族在二战期间以及此后集体受难的记忆。波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纪念馆,都以受难和抵抗为主题。“波兰犹太人历史纪念馆”除了展示波兰犹太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还重点展示了波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令人难以承受的受害细节。“华沙起义纪念馆”所展示的,则是1944年波兰地下抵抗运动试图解放首都华沙并避免苏军接管而向纳粹占领当局发动起义的历史事迹。起义者在力量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勇敢坚持战斗了63天,付出了15.4万丧生的代价,最终失败。华沙后来在德军撤退前被夷为废墟。而苏军则在斯大

林的命令下,静待德军完成毁灭行动才进入华沙。位于格但斯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馆”,旨在将波兰和中东欧在二战中的经历注入欧洲乃至世界记忆中,重在展示“总体战”下的集体苦难。但这种历史叙事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看来不够“爱国”。波兰舆论提议建立的“波兰大屠杀纪念馆”(Polocaust),则更加聚焦于波兰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认同。

在此种受害者意识的推动下,波兰与周边主要邻国的历史积怨显性化,并加剧了波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2017年,波兰议会的一个研究团队发布报告称,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欧洲国家中最大的损失,有权获得德国的巨额赔偿。该团队负责人在2018年3月进一步提出了高达85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向德国索赔的主张,在2017年也获得了时任波兰总理的公开支持。对俄罗斯,波兰在国内致力于消除苏联领导人和苏军纪念碑、像等显示苏联/俄罗斯历史影响的象征物,还于2007年设立“卡特廷事件遇难者纪念日”,纪念二战期间苏联在卡特廷森林秘密处决2.2万名被俘的波兰各界精英。

但波兰人试图塑造和维护的兼有悲情和英雄主义的正面形象和集体记忆的努力,一再遭遇来自犹太世界的冲击和“解构”。在战后的纳粹大屠杀历史叙事中,“波兰责任论”却是个不断发酵的话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

利·维塞尔就曾提出:只有在当地人期望成为一个无犹太人社会的地方,那些装载着人群、令人窒息的运畜列车,才能在暗夜中畅行无阻。在上世纪70年代,耶胡达·鲍尔等重量级大屠杀史学家提出“周围波兰人的态度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波兰在大屠杀中至少还有“冷漠旁观”的一面,这在当时的犹太世界整体上是个共识。

“Holocaust”一词的对象是否应该包含惨遭纳粹屠杀的其他群体,如吉普赛人、波兰人等等,这在70年代末的美国引起

了公开的纷争。“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出于维护群体间友好关系出发,主张其受害者为1100万,即“600万犹太人以及500万其他群体的人们”。推动设立“总统大屠杀纪念委员会”的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也支持这种表述。其他族裔群体的社团组织,如“波兰裔美国人大会”,也要求将其他群体包含进去。但委员会主席埃利·维塞尔则坚决抛弃1100万这个数字,而主张“Holocaust”的受害者主要是600万犹太人。这种立场获得了在大屠杀历史问题上拥有无可匹敌话语权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裔的积极支持。最后,委员会采用了明显有利于犹太人的定义,而大屠杀中600万犹太人遭受劫难成为主流通行的提法,“1100万”的数字渐渐被人们所遗忘。这场大屠杀受难记忆为多个群体“共有”还是犹太人“专有”的争议,

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结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导演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在其9个小时的大屠杀(Shoah)纪录片中,也曾指控一些波兰人因反犹卷入了大屠杀,成为纳粹的帮凶,结果引来波兰政府的抗议。波兰历史学家和公众承认当时波兰社会存在反犹情绪,但并不接受反犹情绪与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的悲剧存在关联的提法。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东欧剧变后波兰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及其在外交上向西方转向,都有利于波、犹之间推进大屠



▲小说《苏菲的选择》同名电影剧照



◀华沙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重要战役。

杀历史的研究和对话。波、犹之间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中角色的争论也出现了一段缓和、和解进程。一方面,部分波兰学者开始反思和质疑波兰自身关于大屠杀期间殉难者/英雄主义的传统历史叙事,开始打破一些敏感的禁忌。1987年,波兰学者布朗斯基(Jon Blonski)撰文提出,波兰人面对纳粹主义野蛮暴行而无动于衷,负有冷漠不作为的“共同责任”。此种观点引发了波兰国内的第一次关于战时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辩论。另一方面,犹太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立场也出现了部分松动。1988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研讨会上,德高望重的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古特曼(Israel Gutman)就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的“不作为”表达了谅解。他在发

(下转 15 版) ▶